



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六九三）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 • — •

—— 增刊 第八六一期 ——  
(二〇一二年八月二十一日出版)

---

本期目录 (zk1208d)

【史海钩沉】	广西都安清查“反共救国团”经过	黄家南
【各抒己见】	毛泽东为什么非搞“文革”不可？	王 蒙
【口述历史】	我在“梁效”的经历	范达人·郑实
【文革一页】	总政赴昆明军区工作组处理“梅花党”事件经过	刘 岩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

【史海钩沉】

广西都安清查“反共救国团”经过

• 黄家南 •

我是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高级中学（都安高中）66届高中毕业生，毕业前夕正碰上“文化大革命”。1968年9月下旬，我从金城江被押送回都安高中后，县公检法军管会将我关押在都安高中的教工宿舍。对我多次踢打批斗，逼我承认参加了“反共救国团”。我虽被吓破了胆，但也感到莫名其妙，因为自己确实没有参加过所谓“反团”，所以供认不出来。

后来，他们就采取串供的办法，请那些早已供认参加“反团”，写了“认罪书”，得到“解放”了的同学向我透露他们供认的所谓“材料”。

为减少皮肉之苦，我也照他们提供的材料模式写了“认罪书”，这样才过关，并获得“解放”。得到“解放”后，驻都安高中工人宣传队还带我们（约40人）步行两天，到90多公里远的七百弄区弄程大队办一个星期的“受蒙蔽学习班”（其他所谓罪恶最严重的头头则被关在县文化馆，没有资格参加），听七百弄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蓝荣英忆苦思甜。回来后，又被继续关押审查。

据后来的广西处理“文革”遗留问题资料记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案是广西“文革”中涉及面广、株连人数多的特大冤案、假案、错案。

#### ◇ “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案的由来

1968年5月17日，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上报《破获蒋匪“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一案报告》。报告说，已捕获团长、副团长、政治部主任等共63人，并缴获反动组织纲领、印鉴，与国外敌特机关联系的秘密通信地址及部分枪支弹药等罪证。

这份报告还说：“该反革命组织涉及南宁市及南宁、玉林、钦州、柳州等四个地区。”“于今年2月3日正式合并定名为匪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分团下设大队、中队，全区已发展匪徒两千人。”“发展组织活动特点是：利用群众组织中的派性，易地活动，钻进群众组织，互相串联，靠打砸抢补给经费，通过武斗掌握武器，总部设在南宁市解放路新风街（广西‘四二二’控制区），利用‘四二二’据点造反楼做联络站，与越侨有联系。”

5月20日，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各军分区和革委会发出《关于继续深入侦破“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问题的指示》，要求把侦破这一案件当作一个战役来抓，要指定专人，组织专门办公室，充分发动群众，力求彻底侦破。

6月13日，南宁市革委会负责人在市各级革委会负责人大会上说，广西已破获一个反革命集团——“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总部设在南宁市。他要求各单位发动群众彻底侦破此案，开展所谓“三查”运动。一查“走资派”幕后活动，二查“叛徒”、“特务”活动，三查地、富、反、坏、右的活动。他最后强调，要抓紧“三查”，为成立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扫清障碍。

6月17日，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发布《关于破获“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反革命案件的公告》（简称《六一七公告》）。该公告称：这个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混入了群众组织中，有的还当了群众组织的头头，打着造反旗号，狡猾地利用群众组织掩护他们进行反革命活动……现在，这个反革命集团并没有完全摧毁，必须彻底追查组织。公告强调，要动员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立即行动起来，彻底清除这个反革命组织。公告发布后，在广西全区掀起了声讨“反共救国团”的风潮。

6月18日，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又向各专区、市革委会、各军分区、人武部发出通知，要求各地要统一认识，结合各地区情况，进行部署，以便更好地推动对敌斗争的深入开展，要通过印发传单、有线广播、向群众宣读等形式，广泛深入宣传《公告》，要召集群众组织负责人座谈讨论，检举揭发“叛徒”、“特务”和一切“反革命分子”。

6月23日，《广西联指报》头版头条全文刊登《六一七公告》。头版下半版刊登广西“联指”指挥部的《关于彻底摧毁蒋匪反革命集团“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总攻击令》。《总攻击令》说：“‘反共救国团’深藏于‘四二二’组织之中，‘四二二’的头头就是‘反共救国团’”。《总攻击令》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行动起来，清查“反团”，对“抗拒缉捕者，可以就地处决”，“要从政治上、组织上、军事上把他们打个人仰马翻，杀个片甲不留”。此后，“四二二”中有一大批人被当作“反共救国团”逮捕关押和枪杀。

同日，广西“四二二”指挥部发表《就广西革筹、广西军区〈六一七公告〉告全区人民书》指出，《公告》的发布，是为更大规模的血腥大屠杀，消灭广西“四二二”一派群众组织大造舆论。

#### ◇ 都安清查“反团”的经过

1968年7月21日，都安县革委会主任田长喜在县革委会常委会上说：“现在的问题，对阶级斗争，有些反动的东西，还是弄不出来，反共救国的黑手，电台问题，还未具体弄出来，对现实的阶级斗争，应通过‘七三’布告，掀起对敌斗争高潮。”

8月17日至19日，县公检法军管会唐毓凤参加河池地区革委会召开的各县军管会主任和侦破组长会议回都安后，立即到高岭区去侦破“反团”线索。

8月29日晚，在县军管会召开的全县政法公安干警大会上，唐毓凤认定，发现高岭地区有“反共救国安民党”、“义和党”、“反共突击队”等反革命组织，在进行反革命活动。

所谓在高岭发现“反团”，是唐毓凤编造的第一起冤案。

高岭中学学生黄青健参加少数派（“四二二”），被多数派师生多次揪斗吊打。多数派为了把少数派打成反革命组织，就把黄青健拖去高岭街上看广西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关于破获“反共救国团”的公告。在多次捆绑吊打、软硬兼施、刑讯逼供之下，黄招认参加了“反团”。唐毓凤得到这一材料后，就大吹特吹他侦破“反团”的经验。

9月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都安公检法军管会向各区（镇）革命委员会、公安员发出《都安县公检法军管会关于在“文革”中发现61个反革命组织线索的通知》，通知说：“为了稳、狠、准地打击美蒋、苏修特务，叛徒，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以及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彻底地把‘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军广西分团’的反革命组织通通地摸出来，坚决将他们消灭……我会所掌握的各地反革命组织线索提供给你们……便于发动群众配合侦破参考。”

12月14日，都安县公检法军管会将“广西‘四二二’都安革命造反大军第一届代表大会和第五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员定为反革命组织成员的通知”（绝密）下发给各派出所、区公安员、县军管会各侦破组。通知说：“最近，侦破组搜出《广西‘四二二’都安革命造反大军第一届代表大会代表和第五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员花名册》，经核对以后，证实那次代表大会代表和第五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学员，都是反革命总后台覃向奇、黄汉祖直接培植的一批反革命家伙。……现将《代表大会的代表及第五期学习班的学员花名册》印发给你们……”。

据都安处理“文革”遗留问题资料记载：从追查“暗杀队”到后来的“反共救国团”，从上到下，从县到公社、大队、从政法公安办案人员到下面的民兵，都带有严重的派性，把不同观点的少数派和不同意见的老干部主观臆断地定为反革命事件，作为敌我矛盾来打击。所采用的方法，花样繁多。

第一、刑讯逼供。包括捆绑吊打，装进麻袋踢下楼，驱赶跑步等方法。

第二、采取多种形式进行诱供。

一种是审讯人员事先把追问的内容写在笔记本上，故意让“受审”人看，使受审人照着招供。

一种是有意让受审者听到需要交代的内容，让受审者听到后照着交代。

第三种是指名问供。高岭中学黄青健被捆绑吊打后，还不知如何交代反动组织名称，后该校老师韦俊带黄去看区革筹、广西军区的“六一七”公告，第二次审讯时，黄才交代出“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后再指名问供拼凑，黄便交代出“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都安纵队高岭支队”的名称。

第四种是拿追逼出来的假供词叫受审者照着交代。

第五种是组织所谓的“坏人”斗“坏人”以达到串供的目的。在旧文化馆学习班里的两兄弟吴祖浩、吴祖荣因“反共救国团”案被关，吴祖浩交代不出“反共救国团”的纲领，军管会唐毓凤采用所谓的“坏人”斗“坏人”的办法，让吴祖荣来斗哥哥吴祖浩，把“反共救国团”的纲领讲给吴祖浩听，这样吴祖浩就懂得如何交代“纲领”了。

这样造就的这起都安“反共救国团”冤案中，有17251人被揪斗，3341人被诬参加“反共救国团”，其中441人被迫害致死。在这起冤案中，被株连的亲属，则超过8、9万人。

作者黄家南，为中共南宁市委党校副教授

□ 原载《炎黄春秋》2012年第5期

~~~~~

#### 【各抒己见】

毛泽东为什么非搞“文革”不可？

• 王 蒙 •

我相信1966年的中国，“文革”已经是在劫难逃了。

毛泽东是极富创意的不停顿地进行革命的人。他心比天高，才比天大。他来到地球上就是来干革命的，是造全世界的反的，尤其是要造那些比他与他的国家强大富裕自命优越的大人先生们的反。就像帕瓦罗蒂，他是来给人类唱歌的，不唱了，他也就离去了。

毛泽东的青年时代的词《沁园春雪》；长沙》有句曰：“粪土当年万户侯”。其实，毛泽东更有兴趣的是粪土当今万户侯、万卷书、亿万富豪。

而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有著名指示曰：“要敢于摸老虎屁股”，即要向强大者挑战。1965年，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退出联合国，首倡在奥林匹克运动以外另搞一个新兴运动会等，乔冠华趁着酒劲为《人民日报》撰写了社论：“苏加诺敢摸老虎屁股”，受到了毛主席的好评。一是在对苏加诺表示支持的一个外交声明里，毛泽东给加上了“苏加诺摸了老虎屁股”的字样。为此还引起了前苏联外交部的自以为是的责备：“怎么能用这种低俗的词儿？”

是的，毛泽东一生，他要摸国民党蒋介石的老虎屁股，他干脆赶走了这位老虎。他百分百地成功了。他要摸美国与联合国的老虎屁股，他也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他要摸前苏联这个社会主义阵营里的头号老虎的屁股，他也基本成功了。他干脆摸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屁股（除了与咱们站在一起的阿尔巴尼亚与对苏闹独立性的罗马尼亚），他也没有吃亏。他也摸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老虎屁股，痛痛快快地骂了法共与意共。他摸了地主老财的老虎屁股，搞得地主老财哭爹叫娘，魂飞天外，并消灭了这个阶级。他摸了资产阶级的老虎屁股，只动了一个小姆

指就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为君谈笑定“资”“社”。1957年，他摸了大知识分子与民主人士的老虎屁股，其实，一摸就知道了，不是老虎而是老鼠最多是呱呱叫的青蛙的几乎体量等于零的小屁股，对于他老人家来说，实在是不堪一摸。在1958年，他要摸的是整个经济规律与经济体系的老虎屁股，他受挫了，是严重受挫，使老人家深感郁闷。而到了1966年，他摸的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政府的各级组织各级领导各种党阀军阀（他的话）的老虎屁股了，他要粪土这一切现有的自己的体制与权力运转机制了！

20世纪60年代，“三面红旗”的受挫使毛泽东稍做调整，接着不是转弯而是一不做，二不休，变本加厉，干脆把“革命”往更加彻底的方向猛推。他老人家益发愤怒与蔑视世界上已有的所有社会体制和它们的代表人物：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前苏联式计划经济的、社会民主党与工党式的、宗教原教旨主义的……他都看不上。他认为，这所有的体制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压制大多数，保护少数，使不平等变成永远。这一点在“文革”后期他谈“资产阶级法权”的时候，最为惊人，也最为高深莫测。

这一点他与列宁不同，列宁强调的是无产阶级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在1989年底，前苏联解体以后，我听到过咱们的一位喜欢琢磨事的部级领导干部讲，资本主义大国要搞对我们的和平演变，优势在他们那一边，我们的应对方案就是抱成团，拧成一股绳，就是说靠组织的力量抵御演变。他的话应该说完全符合列宁的教诲。

但是请看，天才的，集诗人、哲人、统帅、舵手、领袖气质于一身的毛泽东与列宁不同，他相信自己的史无前例的思想与艺术，相信群众，相信人海战术，却并不那么迷信叠床架屋的组织与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车越坐越好，房越住越宽，脾气越来越大的官员（以上的说法是毛自己讲的）。他不相信正规的组织原则与组织程序，也不那么相信他的同僚战友。确实他的思想冲天震地，很难找到同道，叫做曲高和寡，与俗鲜谐。有时候他自己也可能解释不清楚他到底要干什么。他要求革命的彻底性，再彻底，再彻底彻底，永不停歇。他领导的时代，最喜欢批判的一个思想观念就是：船到码头，车到站。也就是说，他的革命机体是永无码头的海轮与永不停站的机车和永不落地的飞机。

他决不俯首给任何组织，包括他个人缔造的与领导的组织。他有一个党章中没有规定过的工作方法：动辄搞一个五人小组、七人小组、联络员，这些非正规军一出现，就把其它的什么组织都管住乃至作废了。尤其是“文革”中搞一个“文革小组”，使政治局、书记处靠了边，甚至变成了“革命对象”。有些地位远远无法与毛主席相比的人，掌握芝麻大的权也要搞小组与联络员，以便拉帮结伙，整治对手，这其实是非组织活动了。

主席整整一辈子，从来都是强调打破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的，却很少提建造制定什么法制规范。

1966年“文革”中，他的发动红卫兵砸烂党委的各级领导组织体系的做法令人瞠目结舌。他所做的不似政变，恰似政变，至少像是解散内阁、国会与全部地方政府。更加罕见的是以领袖与导师的身份走上长安街头——天安门城楼，一次又一次地检阅快要发狂了的红卫兵小将；这几近于是发动街头斗争。他的反对御用红卫兵的说法令人想起“右派”反党的语言，不免晕倒。他的直接号召群众发动群众的艺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除了军队他要紧紧拉到自己这一边以外，什么级别，什么官位，他都置若罔闻。他可真让人喝彩，让人高呼痛快，让人坚信这样的人物中国几千年才有一个，世界几百年才有一个（语出林彪）！

从1949年，他几乎没有一年、没有一个月、没有一个星期好好反思一下调整一下休息一下过。他马不停蹄，不断策划，不断发动，不断号召。他左一拳右一脚，左一掌右一推拿：

“镇反”、“肃反”、土改、抗美援朝、思想改造、“三反五反”、批判胡适、批判胡风、批判《武训传》、批判俞平伯、批判丁玲、批判赫鲁晓夫、“反右”、反“右倾”机会主义、批彭黄张、批合而一的杨献珍、批时代精神汇合论的周谷城、批文联与所属各协会已经滑到了裴多菲俱乐部的边缘、批周扬并说准备派一个团把周扬轰下去。农村也绝对不是世外桃源：一年一年的整社、农村“四清”（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后来又发展到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也不知还要清什么），中国的历朝历代，从没有哪个政权能如此深入村落与农户抓政治运动的。

此外城市“三反”、批《海瑞罢官》、批周信芳、批前苏联导演丘赫莱依，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最后，据说是在杭州西湖畔，风光绮旎秀丽醉人，有人甚至说那是一个消磨斗志的地方——刘庄或者汪庄高级要人宾馆，策划了史无前例、搞得鬼哭狼嚎却又风云激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他总是有一个感觉，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农解放起来比设想的要困难得多，知识分子在压迫他们，官员干部在压迫他们，境外的帝修反在压迫他们或诱骗他们……这样下去，早晚新中国会走旧中国的老路。他甚至感觉革了那么大的命，这个社会早晚会变得与旧社会差不多。而前苏联的经验警告他，如果革命停滞不前，如果革命不彻底，如果共产党只知着眼于执政做官收税修桥修路发展经济，如果“只管粮棉油，不抓敌我友”，那么他的一大二公的理想只能作罢，中国的前途只能是与前苏联一样：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尤其是他的“大跃进”与人民公社的事业将会完全失败，不但会失败，而且会有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抓住他在上述事情上的瑕疵来攻击他，来鞭尸……

所以要趁着他还有强势的时候，再打几个大仗。

与经济建设经济工作上的屡屡受挫成为鲜明对比的是，意识形态上、理论上、文艺上、精神层面上，所有的主席发动的斗争都是百战百胜、所向无敌、绝对冠军、无往而不利。斗得知识分子们尤其是自以为是社会精英的人五人六哭爹叫娘、捶胸顿足、检讨忏悔、束手就范。全国人民则是杀声震天、红旗招展、欢声雷动、热泪盈眶、面貌一新、豪言壮语、气冲斗牛、咚咚咚，锵锵锵。所以这个“大仗”还是命名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这也是失之桑榆——经济，补之东隅——文化与革命。一提到文化与革命，毛主席当然就是打遍天下无敌手啦。这也是失之物质，补之精神。失之粮棉油，补之痛痛快快地抓敌我友。

直到1958年，毛主席其实最重视的是把钢、粮产量搞上去的，但60年代以后，他似乎听不得“生产力”一词了，一提生产力就要批唯生产力论。

请看，“文革”前夕，精神生活已经是极其亢奋、极其革命而革命再革命了，全国人民都在进行着革命化的竞赛，但上边还在找问题，还在嫌不够革命化，还在查找裴多菲动向。回顾一下“反右”斗争后的那八九年吧，本来想搞经济上的超英赶美，不顺利，另辟蹊径吧，下一步不搞“文革”，还能搞什么？难道能放下心来发展生产，娱乐升平，积攒毛主席一向看不起的坛坛罐罐？（按：裴多菲是匈牙利诗人。他的名句是“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匈牙利事件”前该国有自由化知识分子成立的裴多菲俱乐部。）

“文革”的开始也就仍然是从文艺上开刀：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里并无新意。一面是作家艺术家知识分子民主人士知名人士直到老党员（邓拓、吴晗与廖沫沙）拼命在那里指天画地、信誓旦旦，表达自己对于党的热爱与忠诚，声明可鉴此心，昭昭天日；另一面是大有来头的批评者、心狠手辣的文艺行刑官姚文元等断言被批评者大逆不道、心怀叵测、意在谋反、有阴谋再加上行动。一面是被指责者说自己即便是砸碎了砸烂了也没有一个骨节一个细胞反党，

另一面是指斥者论证被指斥者是党和国家的最凶险的敌人，而且认定该犯是清醒的，有意识、有自觉、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地犯下了滔天罪行。这样的绝不对称的阶级斗争风景、政治斗争形式、“肃反”或清理阶级队伍的斗争面貌，可以说是过了这个村没有这个店，古今中外，再看不到也想不到会上演这样的戏。

真正令人大跌眼镜的是“炮打司令部”，是反对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经过“反右”斗争的惨痛教训，举国上下，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都明白，咱们这里是不兴反对领导的，关键在于听领导的话，对领导要言听计从，紧跟照办。谁的胳膊拧得过大腿？哪一个人抗得了组织？离开了领导，你活下去都很困难，一切生活资料，都是有领导地生产与分配的。你有什么辙脱离领导？什么叫向隅而泣的可怜虫？背离了领导，被组织所抛弃，被班主任宣布“谁也不许与他玩”的孩子，就只能向隅而泣，死了也不过是臭一块地。“一块地”的说法来自“反右”中积极分子的发言，这样的透彻可以叫做刺刀见红。问题是咱们这里，请问哪一个昏了心的胆敢向隅而泣？大家都欢欣鼓舞，而你小子向隅而泣，你是不是对人民进行的新一轮的进攻呢？

我在新疆才知道，过去当地平民百姓爱说的是“老天爷在，一切自有道理”，解放后，人们的口头禅变成了，“有组织在，我们怕什么？”

我个人一辈子的体会也是，组织的力量大，但要分领域：政治、军事、体育（如团体操与夺金牌）上，组织的力量无与伦比。在经济、文化上，靠组织则并非百发百中。尤其是写作，一组织起来写，绝对就没戏了。

当“文革”开始后我知道一些青年学生以党委不够革命不够忠于毛泽东为名（按：此说也相当天真烂漫、幼稚愚蠢、矫情做作，乃至昧了良心——那个年代哪个领导敢对毛主席有二心？）向党委提出挑战的时候，我也以为他们会陷入当年鸣放后被捉住的“右派”的狼狈下场。如果说我对小将们略有同情，不是由于小将们有什么可爱，有什么见地，而是由于出面接待小将们的所谓领导干部，几乎都显得那样嗫嗫嚅嚅，哼哼唧唧，躲躲闪闪，没有能力，没有机敏，没有诚恳，没有担当。谁能想得到毛主席亲自出来支持小将，称他们为无产阶级革命派，接受他们的“红卫兵”袖标，而将打压他们的维护组织威力的路线命名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谁又能想到党委的一些领导干部在这种情况下竟那样窝囊、不中用！

至今仍然有一些人，一些那个年代成长起来的人物，将此事半掩半显地解释为毛泽东是在以他的巨大的个人威望为依靠，在中国认真地搞一次大民主，改变官僚政治的掌控体系，为此不惜直接领导一批“革命小将”与各级党委、与既有的组织结构展开一场大会战。

果然如此？此说如白日做梦！如果说不依靠党委组织而依靠小将有什么民主的意图，这种对小将的放手发动，是在什么政治思想前提下进行的呢？恰恰是现代个人迷信，是“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是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的命名，是领袖对于武装力量的绝对领导，是不但万岁万岁万万岁，而且万寿无疆，而且要捍卫毛泽东、捍卫“中央文革”、捍卫江青……就是说假定了全党全国已经埋伏了潜伏了无数反对毛泽东的反动分子啦。一面是这样的绝对拥戴、绝对听命的统一思想，与此同时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铁打江山，就是说是集中统一的思想与集中统一的武装力量，是硬实力加软实力。而另一方面是踢开组织闹革命的准无政府主义，是对于大闹一场的期待，是红色的恐怖。这确实是世界政治史、中国政治史的一绝、一险、一个极危险的乱局。

于是“闹将”江青陈伯达的地位飙升。全国只剩下了一套红书。知识分子与干部们东躲西藏，检讨认罪，昏天黑地，左右为难。各种社会中坚力量中坚人士弯腰低头、戴高帽子游街、被剥夺了工作权利、受尽凌辱。接着闹，闹得一面墙上要贴十几张主席“宝像”。闹得抡起皮带

抽打。闹得疯疯颠颠地打语录战。闹得“牛棚”林立。闹得抄家随意。闹得人身安全彻底失去保障。个人迷信与无政府主义的暴力结合，使得民主与法制、组织与秩序双双崩溃。

这与推进民主有什么相干？这与青年人中难免的反体制意向有什么相干？这是通过搞乱现有的公共管理秩序来解开幻想中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小将们手脚上的桎梏，无法无天地搞一套极端非理性革命秀。

怎么会有很有头脑的小老弟仍然留恋着这样的黑暗年代，并且不无遗憾地探讨着“文革”为何失败了？……

1966年5月7日，与“文革”的开始同步，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五七指示”：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参加工厂、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工人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要批判资产阶级……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公社农民以农为主……兼学军事、政治、文化……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生也是这样……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这个指示宣传得热火朝天，它应该很重要，因为这是“文革”中少有的关于要做什么的正面的“建设性的指示”，其它都是“其心又何其毒也”之类的愤怒语词。这不对，那不对，究竟什么才对？只有这一段，加后面提出的“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要斗私批修”，此指示有一“要”字，你以为是建设性指示，但内容中有斗与批，还是批判性的。就是“五七指示”中，他也提到了批判资产阶级的“文革”，提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的学校的现象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同时他提出了他的社会主义模式：

一、军队起着骨干的作用。

二、不强调社会分工，干脆是抹掉了社会分工这一“老虎屁股”，而强调兼军事、政治、文化，兼做工、农、兵、群众工作和社会主义教育，特别是批判资产阶级。

三、不再提起超英赶美，看不出有追求现代化的意思，这个模式中，生产力、劳动效率、分配，一切与民生有关的话题、与消除贫穷与愚昧的话题，也是世代国人最最关心痛心的话题均未予提到。

四、学校的头面人物仍然算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周总理等的脱帽加冕仪式无疾而终。

五、总的调子似乎仍是公社化。公社公社，一大二公，吃饺子都是几千几万人一个味儿，不仅产权属于公共，行业也是公共，容易平均平等。

我的总体感觉是“五七指示”不无亲切感，调子也不是特别高。它给我感觉到的是自给自足的人群组合，是《诗经》上描写的“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

费解一点的是工农兵学商都要批判资产阶级。什么叫资产阶级？指生产关系中掌握生产资料的资本家们吗？我当时在新疆，新疆的老革命老作家们畅谈着毛主席的理论新意：根据思想状况而不是根据财产状况划阶级。

说法未必准确，实际上自有道理。自1956年公私合营以后，真正的资产阶级没有什么动静了，倒是一些不无棱角的知识分子，被“资产”了个不亦乐乎。

我的体会则是通过批判资产阶级，为的是达到与不招我们待见的恶体制与旧思想旧观念彻底隔离开来，保持毛泽东的理念的纯洁性。



根据思想状况划阶级成分，这玩意儿太玄乎、太恐怖，也太灵活了，有可能发展到凡得罪了领导的一律算资产阶级的闹剧状态。

毛泽东哲学、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提法是“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他侧重的是破、塞、止，是批判，坏东西批判完了，好东西自然而然就来了。这是他老人家的指望，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你哪怕把世界上的所有“害人虫”都扫除干净了，粮食不够吃还是不够吃，房子不够住还是闹蜗居。

我还觉得，“五七指示”的内容相当泛漫，尚无定见定则，只是个模模糊糊的方向，说明当时“文革”到底要干点什么尚未明晰成型，先发动起群众至少是小将起来再说。这也很天才很潇洒很艺术也很有灵感，大艺术家多半是随机应变走着瞧，一面涂一面捏一面哼哼一面设计一面修改一面即兴发挥一面突然爆炸。毛泽东搞“文革”如罗丹之搞雕塑，罗丹的说法是：“怎样做雕塑呢？把不要的统统凿掉就是了。”毛泽东已经颇有这样的经验，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群众运动永远有理，让群众闹起来再说。一头是他，是伟大领袖、导师、舵手、统帅；一头是群众是小将、是高呼口号热火朝天、是斗志昂扬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的人民，这样的千军万马，怎么干怎么对，怎么干怎么胜利。

历史就是这样粗线条地被创造的。谁能画好了平面图、鸟瞰图、透视图、结构图、材料图与制定了各种明细表格再开始施工革命？

无论如何，对于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对于造反派的鼓励，对于各级领导的静坐呀贴大字报呀围堵呀之类的冲击，有令人兴奋的一面。有那么一些只会照本宣科与唯唯诺诺的领导，对于叽叽喳喳的红卫兵小将，硬是一句整话也反应不出来。这些离开了使用——我要说是“借用”或“挪用”党、组织、上级、毛主席的权威一级压一级，什么能耐都没有的平庸之辈，正在前所未有地吃瘪，这有新意，有创意，有看头，有戏。

与此同时，坚决维护既有的秩序、维护领导的权威、注意赢得领导的好感、坚信组织的力量比个别机灵鬼或野心家强大得多、坚信得罪了领导绝对没有好果子吃的常识性即当时认为是保守派的见解也是非常强大的，对被号召的所谓革命造反的阻力绝非一般。

还有就是，造反派那边具有许多弱点，有的出身不好，有的历史记录不堪信任更不堪重用，有的不过是鼠头獐目、投机取巧、浑水摸鱼、不靠谱的胡闹，根本上不得台盘。我的印象是尽管有“炮打司令部”的气势，各地区各单位的造反派势力仍然落在“保皇派”之后。想一想当时的所谓北京五大学生造反派领袖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的下场吧，人们不难明白，也不难想象，当时群众组织中两大派的斗争之激烈与造反派之不占优势。

保守派同样乏善可陈：力找后台、照抄照转、势利第一、语言无味、面目可憎。

居然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出现这样的两大派“全面内战”，居然在一个强大的政权与国家机器的控制下面，出现这样的悬疑活剧，这不能不令人拍案叫绝。

还有令人叫绝之处在于，政治时事形势诱发出各种各样的人跳出来表演。把心怀叵测的造反派逗弄了出来。把仗势欺人的“保皇派”逗引了出来。把热衷于打砸抢的暴力坏蛋诱引了出来。把伺机翻案的地、富、反、坏、右煽忽了出来。把党内野心家招惹出来。把风派、震派、政治投机分子挑逗出来。把各种小人、宵小吸引出来。“文革”就像清蒸活鱼与排骨煲汤，就像海鲜与粪便脓血，强大地吸住了各种蜂蝶蚊蝇小鸟蚂蚁蜈蚣……于是街头巷尾、茶余酒后、道

听途说，到处都有小民震服于毛主席的政治艺术。说是毛主席的政策，能让一切牛鬼蛇神跳出来，然后自然是它们的自取灭亡。

我还想起了据说是机会主义代表人物的第二国际伯恩斯坦的名言：“运动就是一切，最后目标是没有的。”这究竟是什么内涵与背景的“机会主义”，我至今昏昏然，希望得到有识者的指教。我更想起毛泽东的著名自诩名言：“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这似乎是一种享受，是一种自我的实现，是一种常人难以抵达的境界。

“文革”后期发表了毛主席的语录，他批评一些官员的毛病越来越多，却要“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毛主席经常替弱势群体讲话，替穷人说话。他反复强调，永远站在占群众百分之九十五的大多数人一边，那么，就是说总有少数的，百分之五以下的人精人核，成为批判斗争的对象。

西方发达国家是到处鼓吹民主的，那是一种对于多数的争取，通过竞选之类的政治宣扬政治激辩，获取多数票，并声言保障少数的应有权利。毛主席也是追求多数的，但不是通过竞选与计票，而是通过领袖、导师直接向群众进行政治动员，通过团结下层、被压迫阶级来取得多数，战胜少数上层人物，战胜乃至消灭剥削阶级，用《国际歌》里的话就是战胜那些毒蛇猛兽。毛泽东的民主是阶级的民主、战斗的民主、人海的民主。

西方政治学强调的是，总统是靠不住的，所以至少从理论上要搞什么多元制衡。中国的搞运动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教训我们的则是：多数是靠不住的，群众运动式的大民主是靠不住的。

大家都记得运动初期主席的话：“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相信，一开始，大家伙儿，包括主席本人，都并没有弄清楚，什么是“文化大革命”的“底”。影片《周恩来》中，演员王铁成饰演周总理，以极相近于周的口音对另一角色“贺龙”说：“文化大革命到底怎么搞，谁也不知道……”我相信周总理确有此言此忧此说。

毛主席也很深沉，他晚年凝重地说，他一辈子做了两件事，一个是打倒蒋介石和国民党，一个是“文革”，前者争议不大，后者赞成的少，反对的多。他的话带有悲情色彩。做一个毛泽东那样的大人物，太沉重啦。

燕雀安知鸿鹄之志？有人认定“文革”的实质是杀功臣。这样说的人政治观念基本上停留在西汉时期。有的人解释为女祸，其思想观念更是来自夏桀与商纣时期。有的说就是为了收拾刘少奇与王光美，除了个人的争权夺利，他们能懂什么历史、什么政治、什么社会理念呢？干脆说是为权力斗争，这是西方媒体记者对于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斗争的唯一解读。就像他们认为毛泽东不喜欢前苏联是由于他不喜欢苏俄式的尖顶建筑风格。有的解释为毛要带着青年反体制搞民主，则是改革开放后西风吹来，乃以最新窺入的西方的平面语言与思路南辕北辙地解读毛泽东了。

你可以分析纯属个人的毛泽东的性格特点，你可以分析任何伟人的个人情绪与偶发因素，但“文化大革命”仍然有其历史的必然、中国的必然，它带来的教训仍然有它的极度深刻性。问题在于，至今没有谁深刻地分析过这个绝非无意义的大课题。

例如毛泽东思想与中华文化的关系。不论毛泽东思想哲学上的叛逆姿态有多么高调，我们从他的“一大二公”的提倡上仍然会看到“天下大同”的观念。“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不必为己”……这样的观念早在《礼记》中就有，可以说斯时已

经准备了中国的20世纪的赤化。孙中山的口号之一也是天下为公。连国民党党歌里也唱：“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就是说，民国是最低纲领，大同者是最高理念。

谁能解释与进一步从政治上从学理上总结1966年开始的十年“文革”？中国人应该干这个活。中国共产党应该干这个活。中国学者应该干这个活。这是中国人的历史与国际责任。中国责无旁贷。正确地毫不含糊地总结“文革”的方方面面，这也是中国对人类历史的贡献。

□ 摘自《中国天机》，王蒙著，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

~~~~~

## 【口述历史】

### 我在“梁效”的经历

• 范达人 • 郑实 •

郑实：范达人，浙江绍兴人，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1962年毕业于北大历史系，同年留校任教。1973年10月至1976年10月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梁效”）写作组长。1975年出席全国四届人大。1976年10月，“梁效”在中共十一大政治报告中被点名，范达人在被审查之后遭到逮捕，1979年释放出狱，回到北京大学工作，现常居美国。

我在读到周一良先生的回忆录《毕竟是书生》和范达人先生的《“文革”御笔沉浮录——“梁效”往事》之后，开始关注“梁效”，希望了解更多真实情况。和范达人先生取得联系后，他回北京时便邀我到他家中一谈。以下是我整理出的部分访谈内容。

郑实：您从1973年“梁效”写作组一成立便作为其中的重要人物。您对“梁效”内部的事情应当说是比较了解的。请您先谈谈“梁效”到毛家湾林彪驻地的情况，以及由此展开的“批儒评法”文章的撰写情况。

范达人：1999年5月，香港明报出版社出版了我写的一本书《“文革”御笔沉浮录——“梁效”往事》。这本书基本上把我知道的一些情况和我的一些看法都写了出来。

梁效在去毛家湾之前已经组织了一个“批林批孔”小组，那是1973年10月。当时我们北大历史系党总支书记徐万民通知我到清华大学工字厅去开会，他说：“你回来后不要向我汇报，也不要把会议的内容告诉任何人。”我当时觉得很奇怪。以往党员的活动都要向他汇报，这次却不要我汇报，感觉很神秘。我去了，见到北大的魏建功老先生，他是古文字学家，当过我们的副校长。还看到周一良教授，他是我的老师，是《世界通史》的主编，又是魏晋南北朝史的专家，是国内第一流的历史学家。还有人民大学转过来的徐琳，是搞马列的。下面就是我。我当时算历史系的年轻教员，我是搞世界史的，当时周一良先生交给我的任务，是要搞美国史。因为当时中美关系松动，要加强对美国的研究。所以我召集历史系一些老师和同学开会，我当了临时的美国史组长，有十几个人。我们很兴奋，希望在美国独立战争200周年的时候，即1976年，能够出一部分研究成果。我当时正作美国史的梦呢。是在这种情况下通知我去开的会。清华大学有6个人，有王世敏、王朝文等，这时迟群、谢静宜进来了。迟群讲话说，上面有意思让北大、清华组成“批林批孔”材料小组。因为林彪有“尊孔”的言论，希望我们进一步搜集资料。谢的讲话也差不多这个意思。还说这个事情要保密，不要跟其他人讲。我们把清华在此之前搞的材料看了一下，没几条，很单薄。所以我们提出要到毛家湾进一步发掘材料。向迟、谢报告后，得到了批准。时间大概是10月下旬11月初。具体时间记不清了。一个面

包车带我们这10来个人去了。去了翻箱倒柜，搞他的材料。第一次材料掌握不多。第二次还是第三次，我们就发现在一个瓷缸里，有很多条幅。打开一看，就是林彪写给叶群的，叶群又回赠林彪的：“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我们当时看了这个材料很高兴。按当时杨国荣的观点，“克己复礼”就是搞复辟。后来我知道，这些被发现的材料直接送给了毛主席。

郑：当时是否明确赋予你们权力，林彪的东西都可以随便检查翻找吗？

范：对，只要是为了找和孔有关材料就可以。他的笔记、书上的眉批、写的条幅、对联都可以。

郑：都是对原件进行抄录吗？

范：对，抄下来就报给迟、谢，他们再报给毛主席。

郑：您第一次进入林的驻地，觉得有被翻动过的痕迹吗？

范：那当然。我们去之前早就经过多次搜查了，我们去的时候已经重新布置过了。说是林彪住宅的原貌，但还不是原始的样子。我能感觉到，比如叶群卧室的墙上挂满了仕女图。一般不可能，挂画也就是挂几张就完了，怎么可能挂得满屋全是？

郑：你们当时的目的性很强吗？就明确的要把“林”和“孔”联系在一起？

范：对，目的性很强，去之前，迟、谢就告诉我们，“发现林彪有‘尊孔’的言论。”让我们进一步搞材料。

郑：您是搞历史的，对中国历史应当比较了解。当时对把“林”和“孔”联系在一起有什么想法？

范：林彪事件发生以后，向我们传达了毛主席给江青的信、“571工程纪要”等，然后开展大批判。一开始是批极左，大概批极左就批到文化大革命上去了，所以毛主席感觉到这样批林不对头。

郑：这是您当时的感觉还是后来的感觉？

范：当时我觉得林彪打倒一切，的确是极左。文革初期我受冲击很厉害。所以我对左的言论比较反感。当时批极左我能接受。叫我们把林彪和孔孟之道联系起来，开始我不理解。后来知道批林是左还是右，毛主席有他自己的看法。

郑：您当时是北大历史系的年轻教师，受到的学术训练还是相对少一些，但是像周一良先生、魏建功先生那样在1949年之前就开始独立的学术研究，他们对这样把两个不相关的东西联系在一起，没有产生过怀疑？

范：没有。我看他们当时也是出于对毛主席的信任，还很积极工作。查资料、编写材料都很积极，认为自己是在按照毛主席指示工作，还是很光荣的。

郑：从我一个后人看来，林彪阅读一些中国传统文化中较有代表性的典籍，是很正常的。您在回忆文章中也提到，你后来在“梁效”执笔批邓，自己也认为牵强附会。那么对“批林批

孔”，您是不是也认为有这种意味？

范：我没觉得，因为的确找出林彪“尊孔”的言论了。我们还编了《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经过毛主席的审阅，作为一号文件发表。后来批邓，《红旗》让我们写一篇文章《邓小平与孔孟之道》。我们查了半天，只查到邓有一句“尊孔”言论：“名不正，言不顺。”后来就说，孔子搞复辟，邓小平搞资本主义，也是复辟。这是拼凑出来的，的确牵强附会。

郑：您一直坚持认为：“梁效”不是江青“四人帮”的写作班子，是毛主席的写作班子，是在贯彻毛的思想。这在当时，是您和“梁效”其他成员一个普遍共识吗？

范：对，这个问题应当说清楚。粉碎“四人帮”以后，一个普遍的看法，中央文件也这样定的性，都是说“梁效”是“四人帮”的写作班子，有些甚至上纲为“‘四人帮’的反革命别动队”、“篡党夺权的急先锋”。不可否认，“梁效”和江青关系密切。她出题目让我们写过文章，《孔丘其人》、《批因循守旧》、《批小国师大国》都是；她还召开座谈会让我们“梁效”成员参加，带着“梁效”，还有“唐晓文”去天津，宣扬儒法斗争的历史，到小靳庄访问等；后来她还到过“梁效”驻地，在迟群安排下，一一跟大家照相。关系密切这是事实。但是从本质上、从总体上来说，我认为“梁效”是毛主席经过谢静宜、迟群掌握的一个写作班子。这个写作班子主要任务是编材料、写文章，而不是什么“别动队”，组建是毛主席提议的。

郑：您是通过什么确定它是毛主席组建的？

范：谢静宜亲口告诉我的。“梁效”成立后的第一个任务是到毛家湾林彪驻地搞批林批孔材料，这个材料编成以后，毛主席批发为中央一号文件。材料批准以后，“12·5”体育馆召开中直机关大会，周恩来总理亲口讲的，说：“你们这个材料受到毛主席的称赞。”后来我见到谢静宜，问她：“究竟怎么个关系。”她说“梁效”的组建是毛主席提议的。毛说：“你们光找清华人不行，你们要找北大文科的老师一起搞。”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工字厅会议。

第二点，“梁效”大量的工作是编材料、写文章。公开发表的据说有181篇，宣扬的都是毛主席晚年的思想，都是贯彻毛主席的一系列指示。批林批孔、讲林彪路线实质是极右的、儒法斗争、评价秦始皇、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毛主席都是有指示的。评《水浒》的批示也直接发到“梁效”。批右倾翻案风，毛主席的指示首先传到了我们这里，我们都到清华去听会。毛主席有一句话，从另一方面解读，关系说的很清楚。那时刘冰等人写信告迟群、谢静宜，毛主席说：“他们要打倒迟群、小谢，矛头是针对我的。”

最后一点，“梁效”的去留存亡，也是经过毛主席定夺的。比如我们工作到1975年9月，谢静宜就问毛主席，下一步怎么办？毛主席说，继续写文章，还要搞点注释、编材料，这都是毛主席说的。另外我们“梁效”作了大量注释工作，编大字本的材料，送政治局，都是为毛主席服务。

郑：但是，毛的很多事情都是通过江青来传达的。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怎么能分得清哪些是毛的思想，哪些是江的思想？

范：你的问题提得很尖锐。其实，如果用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判定，毛主席跟江青的关系，从总体上，从政治思想上，我的看法，他们基本上是一致的。毛泽东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帅，江青是他的干将。当然，江青在有些地方上搞得出轨，毛对她有所批评，甚至十分严厉的批评，但在总体上，他们是一致的。这种批评有时是恨铁不成钢，有的时候是小批评大支持。

郑：您进入“梁效”后，很积极地工作，所以难免被认为是深入地介入到当时政治斗争中，但您自己并不认为对高层的权力斗争很明了。比如，“批儒评法”，您就否认当时知道这是针对周恩来的，但是后来的专案组，及群众的普遍看法都不是这样。

范：你的问题比较尖锐。就是我在文章中是不是有意影射、攻击周总理。我要根据当时的情况如实地跟你谈一谈。到现在，舆论还是认为，“梁效”是反对总理的。现在的报纸杂志上，还继续这个调子。我只能从我本人来讲，我有没有在文章中影射、攻击周总理。我在“梁效”期间一共参与起草了34篇文章。其中28篇公开发表。一些重头文章，比如《林彪与孔孟之道》、《孔丘其人》等等，到最后《永远按毛主席既定方针办》，都是我参与的，所以人家说我参与了好几篇扰乱全国的文章。

1973年，我进入“梁效”，曾经风闻，毛主席对周恩来有所批评，比如“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出修正。”但是究竟毛和周怎么回事，我还在思考过程中。我们1973年底编写完批林的材料，1974年一号文件发表。1974年我们写出第一篇重头文章《林彪与孔孟之道》。就在我们写文章的前夕，我听到一段对话：毛主席在接见一次外宾后，跟总理讲：“你给整得够呛吧？”总理说：“没有没有，我刚才还说我不会抓大事。”然后两个人对着笑了。

郑：这是什么人告诉您的？

范：这是我很亲密的一个人告诉我的。

郑：他是怎么知道的？

范：听到文件传达的，这段话对我有很大作用。我心里就明确了，虽然毛主席对周总理有所批评，也比较厉害，但是毛主席并不想把总理像刘少奇、林彪那样打倒，还要使用总理来维持全国的局面，来贯彻他的意图，所以我心里就有一个准则，不能影射、攻击周总理。比如《孔丘其人》这篇文章，一开始就说，“刘少奇、林彪这一类政治骗子……”我故意加个字“这”，“这一类政治骗子”限定一下，避免引起人们的误解。后来人们说我们文中说到孔丘时，有“七十一岁，病重在床。”这是影射周恩来总理。很多文章里都这么认为，甚至文件上也这么说。我说：的确不是。那个时候，我们查过孔子年谱，是有这种情况，我们之前别人的文章里也这么说过。我们写文章时，是1974年2月，总理那时经常出来接见外宾、参加各种活动。我们这些小老百姓怎么能知道总理的健康状况，这是高级机密。1974年6月之后，才知道总理有病住院了。

郑：“梁效”受审查期间，专案组让您承认影射了总理。您当时陈述了这个证据，他们认可吗？

范：他们当然不认可了。他们认为你不老实嘛，认为我态度很不好，认为我是关键人物，因为我是“梁效”写作组长，且是写文章最多的一组的组长，重要文章都是我们小组写的。突破我这个关键人物，“梁效”的内幕就揭开了。当时主要抓两点，一是反华国锋，这是最重要的罪状。因为1976年10月4日《光明日报》发表《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就是我们小组写的。要我们承认，这是反华国锋，是篡党夺权的动员令。这个厉害得不得了。第二是反敬爱的周总理，主要是《孔丘其人》这篇文章，有“七十一岁，病重在床。”说这句话是影射周恩来总理，但这篇文章是很多人拼凑的，八易其稿嘛。当然我是这篇文章的主要执笔者，而且，“七十一岁，病重在床。”就是我写上去的。

郑：您回忆录里说，当时迟、谢也没有授意您针对周，写这篇文章只是要“批林批孔”的。现在有的文献说，当时江青是很公开地把矛头指向周的，其政治斗争的意图相当明显，连地方上的造反派都借机反周。“梁效”的成员会一点都没意识到？

范：我只讲我自己，我当时完全没有，我对自己很清楚，我只能如实说话。“梁效”其他的成员，只有他们自己来说，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我在“梁效”期间，迟群、谢静宜，包括其他“梁效”头头，没有授意我影射、攻击周恩来总理，从来没有。我本人也没有和任何人私下议论，影射、攻击周恩来总理。后来，学习班要揭发我，但找不到证据，说范达人在底下散布言论对周恩来不满，要攻击他。我声明没有。

郑：江青反周的意图是明白无误的。您认为，江青为什么从来也没有公开指示或者暗示“梁效”的成员，要在文章中攻击周？

范：这涉及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系问题，当时的内幕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完全公开。我举个例子，现在有些材料说，1973年11、12月，根据毛主席指示，政治局开会，批评周恩来总理，批评了20几天。会上很多人发言批周，还专门成立了所谓“帮助周恩来小组”。会上怎么批的，周恩来总理怎么发言的，真相没有披露，只有个别透露一点点。如果尊重历史，尊重事实，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就应该把真相告诉人民。

郑：陈熙中老师在“梁效”时每天记日记，他给我看过，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梁效”的生活很平静。除了不得在房间会客，不得把所写的文章内容透露给他人，周末回家，周日晚上必须归队之外，好像没有传说或想象的那样神秘。当时那段生活，给您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范：进入“梁效”，我当时感觉到荣幸。觉得是党的信任，觉得这个班子是毛主席要求建立起来的，虽然当时不明确，但我们心里知道谢静宜是挂在哪条线的。选拔的人都是党信任的，而且应当说都有一定的能力的。我当时很高兴的，真的，就是要积极干，觉得路线问题解决了——毛泽东路线。就是这样一种心态，所以一开始并不觉得有问题。后来慢慢有一点使我感到不快乐的地方，觉得“梁效”的领导好像对我有点看法。有一次我问一个“梁效”的成员：“‘梁效’的饮食每天补助多少钱？”他说：“四毛钱。”我问：“谁补助的？”没过多久，“梁效”的支部书记马上找我谈：“我们补助多少钱你难道不知道吗？你问这个是什么目的？”我觉得他怎么这样？我是随便问问。后来有一次，我说，我们给毛主席和政治局选编的大字本的文章，听说外交部的同志那里也有。好，这个事情也反映上去了。又找我谈话，说，你和外交部的人吃吃喝喝，我们跟外交部的人一点关系都不要有。搞得我莫名其妙。我想也许因为我夫人是外交部的干部，他以为我跟外交部关系密切，好像我通过我夫人，会把“梁效”的情况告诉外交部的有关人。

郑：您看到过当时光明日报社莫艾审查组组长王忠人的回忆文章，记述《光明日报》1976年刊发《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一文的前前后后了吗？

范：看了。我还看了他接受凤凰卫视的采访。

郑：您认为他说的符合事实吗？

范：他把我们具体的写作过程说得很合乎事实。得出两点结论：一、《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是《光明日报》约“梁效”写的，跟“四人帮”没关系。二、此文9月30日已经定稿，而且显示了定稿的原件。华国锋在批示乔冠华的报告中说：6个字错了3个字“不是按既定方针办，是照过去方针办。”我认为王忠人作为莫艾专案组的组长，能够站出来实事求是地说

话，很了不起。我真是很佩服他的精神，这是要有勇气的。不过我要补充一点，这个问题的大前提，就是“按既定方针办”到底怎么出来的。我经过了调查研究，弄清楚了。最早是华国锋在1976年8月的计划会议上传达的，说毛主席最近有两个指示，一是“按既定方针办”，一是“国内问题要注意”。这是我在人民日报社工作的同学8月告诉我的。《光明日报》的汪波清找我们约稿，给我们念计划工作会议的纪录，也是“按既定方针办”。后来《人民日报》社的同学又告诉我，他们起草1976年9月16日的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第一次把“按既定方针办”用黑体字排出来，说他们在起草过程中商量，最好加上毛主席语录，能反映我们要继承毛主席遗志。他们看到新华社内参，登了华国锋的讲话，觉得这句话很好，就用上了。据说华国锋因为“坚持两个凡是”：“坚持批邓、坚持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革命路线”后来挨批了。之后，有的单位曾经传达华国锋的错误，其中有一条，就是传错了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本来说是“按过去方针办”，他传的是“按既定方针办”，所以归根溯源“按既定方针办”是他传错了。后来我亲耳听到传达，彭真就说，完全是咬文嚼字，两个有什么区别？

郑：您听到这个传达是什么时候？

范：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华国锋是这句话的始作俑者。10月4日，《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文章发表，其中有一句话很厉害：“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没有好下场。”他便疑神疑鬼，过于敏感，当时他和“四人帮”的权力争夺是白热化的。《吴德回忆录》中有讲述。

郑：那么您的看法是，这件事完全是一个误会，或者说是阴错阳差成为了一个大的历史事件的导火索？

范：这个事情对我们“梁效”来说，首先是个冤案。对《光明日报》社莫艾、孙关龙两人来说也是。我们“梁效”被审查两年多，最后把我关进监狱，重要罪名之一就有这一条：反对华国锋。我始终不承认，说没有！

郑：您当时坚决不承认，需要很强大的决心。您从来没有想到迫于压力承认算了？您当时是怎么想的？

范：我觉得应该实事求是，我相信事情会有弄清楚那一天。我是搞历史的，要尊重事实，尊重历史，不能为了过关，违心地假造情况，迎合他们的需要，编出个故事出来。不能这样。

郑：您难道没想到过，如果拒不承认，就会引起更严重的方式？

范：对，我想到过。即使想到过，我也不愿这样做。按照当时的说法，这样做是失去党性，也失去人性的。

郑：当时您组里有一个人承认了，是吧？

范：是被迫的。被迫承认一些东西，交待一些东西，是有这样的情况。

郑：就是说承认了的人，后来各方面没有受到什么影响。您没有承认，后来入狱一年多。您现在想来，有没有后悔当时过于坚决？

范：当时搞的那套，还是完全继承了文革那一套。当时他们整人的方法跟文革是一样的，我是有思想准备的。隔离审查之后，专案组长就说：“还不承认，我们就要采取更严厉的措施，



你到时后悔莫及。”有的专案组工作人员，对我比较友好，偷偷告诉我：“可能会对你采取比较严厉的措施，你有什么话要带给家里人的？”有的人看到我早上在校园里跑步，目瞪口呆：“你现在还锻炼身体？”所以我有预感。后来真变为现实了，把我作为从严处理的典型，关进监狱。当时我很难受，很失望，茫茫一片黑暗，不知何时是尽头。觉得范达人可能完了，可能死在监狱里头了。我想，这也是命运的安排。听天由命。

郑：您后来从狱中出来，回到北大历史系。当时不允许您教课、写文章。原来您一直是业务比较拔尖的，现在地位一下子变了，有一个巨大的落差，您当时有什么样的感受？

范：从监狱里放出来，一开始在学校里，专案组还让我一边接受监督劳动，一边交代。后来历史系的党总支书记认为不要这样做，他说让我去打扫厕所是侮辱人格，后来就允许我回家了。那时北大党委是比较实事求是的，他们知道我们去“梁效”的整个过程：是党派去的。我们这些人什么情况，他们心里有数。当时上面有三条禁令：不准上课、不准写文章、不准出头露面。我这个人有点奇怪，我出来之后，无所谓，人家觉得抬不起头来，我没有犯罪感。我照样去游泳，照样去会见朋友聊天。人家觉得很奇怪。我认为自己做的那些事是按照毛主席路线、党中央的指示，我没搞什么阴谋诡计。你说我反华国锋、反对周总理，我没做那样的事，我就没有犯罪感。你说三不准，我还照样写论文，是跟别人合作。学报看了要用。人家就议论了，说怎么又有范达人的文章？就让我改名，我就改了笔名。

郑：当年“梁效”的有些成员，似乎没有受到那段经历的影响，现在在国内的发展很好。人生境遇殊同，您有没有想过，如果当年没有卷入到“梁效”中来，您现在的人生轨迹可能很不一样，也许在学术上的成果会更大？

范：总体上说没有这样想，因为这是命运的安排，到“梁效”不是我自己的选择。

郑：您在“文革”中为“梁效”服务，其行文逻辑都是那种充满火药味的阶级斗争式的；文革后您搞比较史学，跟以前的方式则完全不同，过去的这种思维方式实际是在您的盛年时期形成的，对您的影响很大。后来您要开始真正从事学术的研究，必须要经过一个彻底的转换。您当时觉得这种转换困难吗？

范：转换好像不是很难。文章写多了知道怎么写文章。转到学术性文章并不困难，很快就适应了。

郑：我看了您的回忆录，觉得您的行文很坦诚，但是里面有没有您出于各种考虑，有意隐讳的？

范：有讲得不够透的地方。有些地方会涉及到很多人，分寸拿捏起来比较困难，有些人因为我写这个不高兴，这我也知道。比如，我在书中公布了“梁效”名单。有的人说，本来人家不知道我是“梁效”的成员，你这样一公布，大家就知道了。我认为这是事实呀。过去说到“梁效”，大家只知道四老：冯友兰、魏建功、周一良、林庚。他们背着“梁效”的黑锅。大家也不知道范达人是何人。弄清楚历史的真实情况对大家都有好处的。

郑：有些人不希望别人知道自己曾是“梁效”的成员，不希望自己的名字和“梁效”联系在一起。您认为他们是出于什么样的心理？

范：这个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你以后有机会的话，可以问问他们。

郑：国内的媒体上很少提到“梁效”。偶然提到的，也还是认为“梁效”是“四人帮”的写作班子。这正是您努力想澄清的，您认为大家会接受您的看法吗？

范：我讲的是事实。我是学历史的，我相信历史的真实是有强大生命力的，真相终会大白。

郑：您在回忆录中附录了当年批判您的大字报，您当时是出于怎样的想法要把它们保留下来？

范：这是出于搞历史的人的习惯，保存原始资料。我看到那张大字报，那么长，而且是专门讲我的，就去抄下来。说实话，我没觉得特别反感，因为那时批判会上调子比这高的也有。我当时站在那，抄了有两天，一字一句把它抄下来，然后妥为保存。后来入狱都没丢失。

郑：别人见您在那里逐句抄大字报，不会觉得奇怪吗？

范：我们那个专案组长问我：“怎么样？”我就笑笑，没回答他。我想：让历史去判断吧。

郑：关于“梁效”的这段历史的个人结论是在1988年才做出的。等于您1979年出狱回到北大到1988年，这么长的一段时间才做出结论，您猜是什么原因呢？

范：主要是对“梁效”问题看法有分歧。北大党委的调查研究结果，比较实事求是，认为好多问题不存在。比如《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是否是篡党夺权的动员令，1978年底已经弄清楚了，不是篡党夺权的动员令，跟“四人帮”没有关系。因为，1978年底1979年初，《光明日报》社的专案组就向受审查的两个人讲：“我们过去搞得不对。”表示歉意。

郑：您认为“梁效”的成员对那段历史应当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范：应当把事情讲清楚，应当面对。作为“梁效”成员，有责任把自己当时的思想状况，当时的所作所为讲清楚。至于大家怎么评判，我觉得会按事实来说话。

郑：但是，您这种愿望会遇到一些障碍。首先，这段历史过去这么多年了，社会的关注点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人们是不是还愿意把目光投向这些问题。其次，“梁效”虽然在当时的影响力很大，但其实就个人命运来说，涉及到的人员数量很少。还有，社会的思维是有定式的，人们习惯于把“梁效”和“四人帮”联系在一起，而后者是作为非正义的一方退出历史舞台的，那么要使人们重新认识这个问题，其实是相当困难的。

范：“梁效”涉及的具体人物并不多，只有39个人，涉及的面不大，而且绑在“四人帮”这条线上，所以说清楚这个问题不是很容易的。但是，我相信会说清楚的。王忠人敢于说出来就是一个例子。

郑：但是，王忠人的情况还是不一样的。他当时的角色不一样，他本身没有卷入“梁效”。对“梁效”的成员就很不同。即便说出他们的经历，要让一个社会接受、承认，遇到的情况会相当复杂。而且，我认为，人们今天对待文革的态度还是有很多盲点和误区。主要是我们这个民族普遍的思维习惯，其实还是不够严谨、科学。

范：对，有些人不愿意谈，可能有他们的道理，但是大家还是愿意还原历史的。

郑：您认为对“梁效”的成员来说，“梁效”的经历不是一种罪过，不是要忏悔的？

范：对。应当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加以解释。这批知识分子在“梁效”到底怎么回事，把真相弄出来，可以吸取真正的经验教训。

郑：您说的吸取真正的经验教训，指的是什么？

范：就是知识分子应当起什么样的作用，应当独立思考，认为对的，应当拥护；认为错的，应当鞭挞。真正从社会良知的角度上来写文章，起到很好的舆论作用。

郑：以您为例，您也承认当时效命“梁效”时，您是发自内心地拥护政权的，也是很真诚的。

范：知识分子不应作为一种工具依附于某社会集团，但宣扬自己认为对的观点，无可厚非。如果认为不对，应当发出不同的声音。

□ 原载《信睿》2012年第3期

~~~~~

### 【文革一页】

#### 总政赴昆明军区工作组处理“梅花党”事件经过

• 刘 岩 •

1973年新年伊始。解放军总政治部派出以干部部部长魏伯亭为组长的14人作组，赴昆明军区调研“批林整风”运动情况。这个工作组历时两个月，于1973年3月初回到北京。

总政赴昆明军区工作组在昆明期间，遵照周恩来的批示，处理了一件有关所谓“梅花党”的奇特事件，现回顾整理出来，以飨读者。

#### ◇ 周恩来委托魏伯亭代表中央在昆明听取白姓女子的“绝密”举报

1973年2月，春节假期刚过的一天晚上，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的秘书祝庭勋，用保密电话机给住在昆明军区九号院招待所的魏伯亭打电话说：“周总理批来一个办件，要你在昆明听取一名叫白××的情况反映。总理的批件天亮后交机要交通寄去。”

周恩来的批示，写在一封由云南丽江寄给“江青同志亲启”的信件上。写信人是云南丽江地区粮食局的一名女性基层工作人员，她于1972年底寄“绝密”信函给江青，声称她被一伙“反革命集团”所控制，人身失去自由。这伙人中有参与杀害谭甫仁者，有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余党，有的人还有枪支。她说，这帮人与云南省及昆明军区的某些领导人关系密切，所以她得去北京当面向“敬爱的江青同志”或周总理汇报。

两天后，魏伯亭收到周恩来的批件，当即带着我去会见昆明军区政委、云南省革委会主任周兴，向他传达了周总理要魏伯亭在昆明接见丽江地区粮食局白××，听取她的情况反映的批示。周兴答应，立即电话通知丽江地区革委会和丽江军分区，派人星夜将白姓女子护送到昆明。

第二天早晨，周兴的秘书告知，白某已经到达昆明。早饭后，我率干事刘进到宾馆会见丽江的护送干部——军分区的一位科长和地区革委会的一名工作人员，他们带我俩到白某房间与

其接谈。

白姓女子是广西百色人，在丽江插队几年后到地区粮食局工作。她年纪二十几岁，白皮肤大眼睛，颇有姿色。这大概是“一伙反革命”争抢、控制她的原因所在。

我告诉白某：“江青同志和周总理收到了你的信件，总理委托现在昆明视察工作的总政干部部魏部长听取你的汇报，现在就可以去魏部长住处接谈。”

她听后瞪大眼睛摇了摇头，斩钉截铁地说：“魏部长我没听说过，再说也不能在昆明谈，必须去北京或云南以外的地方谈！”我强调指出：“这是周总理的指示。”她仍固执己见，不肯同意。

无奈，我和刘进回到军区招待所向魏部长作了汇报。魏部长指示我俩再去告诉她：“去北京绝对不可能，要谈就按周总理的指示在昆明谈，不谈就算了！”

白某听后，犹豫片刻说：“那可不能有云南省和昆明军区的人在场。”我表示请她放心，她才同意跟魏部长谈。

于是，她跟随我俩来到军区九号院招待所会议室。白姓女子经过观察，确信室内只有魏部长、刘进和我三人后，便滔滔不绝、神秘地说开了。

中午12点开饭时间到了，我朝魏部长指指手表，他没有答理，仍耐心地继续听取这个女子的汇报，直到下午1点多钟才结束。

◇ 白姓女子举报的“梅花党反革命组织”来自有关“梅花党”的手抄本小说的虚构

白姓女子在4个多小时的“汇报”中，谈了她要“向中央揭发”的很多具体的琐碎事情，核心是“梅花党反革命组织”。她说，丽江控制她的几个人，都是“梅花党”成员，该组织由广西百色发展而来。其中，×××向她透露，他参与过枪杀谭甫仁的谋划及行动，然后逃到滇西潜伏了起来；×××对她说，林立果并没有在蒙古温都尔汗摔死，他曾去西双版纳接应过空降到那里的林立果，谭甫仁被刺就是“林彪党羽制造的连环谋杀案”；×××家里藏有枪支弹药，他们准备形势不利时“上山打游击”，等等。

谈话中，白姓女子始终表情严肃，态度恳切；她所谈的内容，非常详细；她举报的每一个人和每一件事情，都讲得有名有姓，有时间有地点。看得出，她内心对“梅花党反革命组织”的存在，是确信无疑的。但是，根据我们到昆明将近一个月里所了解和掌握的情况，感觉她举报的大部分内容，是“一伙反革命”为了吓唬和诱骗她而编造出来的荒唐故事。

据此，魏伯亭当晚在向李德生的电话汇报中指出：白姓女子所举报谭甫仁案件中的“漏网凶手”、接应过林立果的“林彪党羽”等人物，绝对不会存在，大概是这些人为了威胁、利诱和控制白姓女子而自我吹嘘；需要查清楚的问题似乎有两个：一是她周围是不是有一个带有政治色彩的非法小组织或淫秽小集团？二是丽江是否有人私藏枪支弹药？查证工作，建议由在“谭甫仁、王里岩被害案侦破小组”工作的公安部的两位同志办理。

很快，李德生报请周恩来同意，公安部通知了在昆明的两名干部，随白姓女子一同赴丽江进行现场查证。

公安部两位同志去丽江查明，白姓女子所说的“梅花党反革命组织”，原来是丽江一些年轻

人，传抄传看了关于“梅花党”的系列故事手抄本以后，移花接木，插入他们身边的一些虚构情节，自我标榜“英雄好汉”，编造出来的惊险、恐怖故事。白姓女子信以为真，为了摆脱这些人的纠缠，便给江青和周恩来写信揭发。

20世纪70年代前期，总政宣传和保卫部门曾经下发通知，要求全军基层单位查缴手抄本小说，大意是：目前发现有些手抄本小说，从社会上流传到了军队内部；这种手抄本小说是“封资修的大毒草”，要求解放军的成员，都要做到“不看、不抄、不传”，发现后要及时封存、上缴、销毁；对违犯这方面组织纪律的，要批评教育以至处分，等等。

当时，我只是听说部队有的基层单位，发现过流传的手抄本小说，但是手抄本是什么样子，小说内容讲些什么，并不知道。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一只绣花鞋》等悬疑小说的作者张宝瑞，在报刊上发表他创作手抄本文学作品的过程后，我才了解了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1969年3月，张宝瑞被学校分配到北京铁合金厂工作。1970年开始，他利用寝室熄灯后或车间上班前的业余时间，给本班组的工友们现编现讲“梅花党”的系列惊险故事。那时，社会上除了官方认可的极少数书籍外，很多文学作品都被当成“毒草”封存起来，人们的精神生活十分贫乏，这就给口头或手抄本小说的流行提供了广阔的空间。1971年春天，张宝瑞把他口头讲过的“梅花党”系列故事，写成了一部4万多字的中篇小说，取名《一只绣花鞋》，在亲友之间传看。不久，这种手抄本小说，通过他的亲友带到西北、东北、内蒙古、山西、云南等地，并在军内外基层单位流传开来。社会上同时流传的手抄本还有《第二次握手》、《少女之心》等爱情小说，诱发了一些人对异性追求的欲望。

白姓女子身边的“梅花党反革命组织”，就是在这些手抄本小说流传的背景下，一些年轻人模仿小说中的人物和情节，添油加醋，虚构出一个所谓“梅花党”组织，企图拉拢她“加入”，成为“同伙”，以利关系的亲近。真相搞清楚以后，查证者哭笑不得，只好让地方有关组织对相关人员进行批评教育了事。

◇ 谭甫仁被害案没有实事求是地及时结案，为谣言的滋生和流传提供了土壤

总政工作组赴昆明军区调研工作的重点，尽管不是谭甫仁遇害案件，但谭甫仁遇害事件余波未平，军区领导人和其他干部向我们谈“批林整风”运动时，必然联系到谭甫仁被害事件。另外，公安部派到昆明协助破案的两名干部，跟我们住在同一个招待所的同一层内，春节放假期间大家都没有事干，闲聊中也谈到一些案件的情况。所以，我们对谭甫仁遇害前后的情况了解得比较清楚，对白姓女子所举报的自称参与了枪杀谭甫仁的活动，可以断定不是事实。但是，为什么会有人冒充“漏网凶手”呢？原因是谭甫仁被害案没有实事求是地及时结案，为一些人造谣惑众提供了土壤。

1970年12月17日谭甫仁被枪杀事件发生后，昆明军区和云南省委在昆明市区内外采取了大张旗鼓的搜捕行动，对社会震动很大，所以谭甫仁被杀害的消息，不胫而走。可是，12月31日凶手被暴露自杀身亡后，案情本已大白，但破案工作仍在“深挖幕后指使者及其同伙”，迟迟未予结案。于是社会上产生了各种谣传和猜疑，不法分子乘机招摇撞骗，丽江白姓女子的“奇遇”就是典型的一例。那么，酿造这种“奇遇”的土壤是怎样形成的呢？

1970年12月17日凌晨4时多，住在昆明军区司令部大院42号楼里的昆明军区政委、云南省革委会主任谭甫仁和夫人王里岩遇刺。王里岩当即死亡，谭甫仁送到医院抢救无果，当天下午逝世。

案件发生后，昆明军区副政委周兴立即打电话向周恩来作了报告。周恩来指示：“要火速组织抢救，案子很可能是内部人干的，要抓紧时间破案，重点是军区机关内部；成立专案组，由周兴负责，公安部派人协助。”

当天下午，昆明军区和云南省革命委员会联合召开紧急会议，决定遵照周恩来的指示，迅速成立专案小组，采用一切侦破手段，力争尽快捕获凶手。根据会议决定，在军区党委直接领导下，成立了“谭甫仁、王里岩被害案（简称017案）侦破小组”，由副政委周兴任组长，军区第一副司令员王必成和副政委蔡顺礼任副组长。

清查工作首先在昆明军区大院内火速进行。凡是在大院居住的人员，不论资格多老，地位多高，是军人还是家属，都必须交代清楚：12月16日晚至17日凌晨，待在什么地方？干什么事情？有谁能证明？

为了防止犯罪嫌疑人逃往外地，军区组织部队对车站、机场进行严密搜查。12月18日晨，昆明火车站被全副武装的部队包围，开往贵阳、长沙、武汉、郑州方向的62次列车，停止开出。车站里的所有乘客，原地不动，接受检查。昆明田家坝飞机场，也被军队严密包围，飞往广州的1031次航班和飞往北京的140次航班，乘客暂缓登机，荷枪实弹的士兵对候机室全体乘客进行了严密的检查。在昆明市区内，军警对大街小巷、地下管道、公共汽车站进行了拉网式排查，但都未发现与案件有关的犯罪嫌疑人。

随着清查工作的深入，军区政治部保卫部发现存放在办公室保险柜里的两支手枪不见了，而枪杀谭甫仁的作案现场留下的弹壳，与保卫部丢失的两支手枪的型号完全一样。于是，围绕着枪支的去向问题又展开了一轮更大规模的清查，军区大院里更加人心惶惶。在清查中，专案组搜集到很多蛛丝马迹，其中真正有价值的线索有两条：

一是谭甫仁的妻妹在刺杀现场看到的情景。谭妻王里岩的六妹王文莹，到昆明探亲住在谭甫仁夫妇的楼下，睡梦中被楼上的枪声惊醒。她来到走廊，看见谭甫仁披着衣服疾步从二楼下来，便问：“姐夫，楼上出什么事了？”，谭甫仁说：“不知道。”谭没有停步，直接转到通往楼后小平房的长廊喊警卫员。警卫员尚未回应，有一个身穿军大衣、戴着口罩、身材魁梧的家伙，提着手枪尾追下来，从谭甫仁的背后连开两枪，但都没击中。谭甫仁转过身，迎着凶犯冲去，凶犯又开一枪（打在谭甫仁的腹部），谭踉跄了一下继续往前冲。凶犯第四次开枪，击中谭的右上臂，谭侧身倒在地上。凶犯冲到谭的跟前，朝谭的头部开了第五枪。

二是政治部家属院的小男孩凌晨看到的情景。清查工作深入后，居住在军区政治部家属院的男孩马××，向专案组反映：12月17日清晨5点左右，有一个人敲开他家的门。说要找保卫部的陈汉中，马××把陈汉中家的位置指给他，关起门来继续睡觉。马××13岁，头脑清晰，说那人个子较高，面孔较熟，好像是王小朋友的爸爸。专案组感到这个线索非常重要，马上找到王小朋友爸爸的照片给马××辨认，马××认定就是他——军区保卫部保卫科副科长王自正。专案组认为，王自正很有可能是枪杀谭甫仁的犯罪嫌疑人。

王自正早已被关押在司令部大院一隅的原战俘管理所旧址，进行隔离审查。他被隔离审查的原因是：1970年初，王自正升任军区保卫部保卫科副科长不久，昆明军区政治部收到来自他老家河南省内黄县的一份检举材料。材料说当地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查出，王自正原名王志政，富农出身，1946年参与了还乡团杀害本村武委会主任的反革命行动。后来王志政逃往外地，改名王自正，混入解放军。军区政治部按照检举线索，派人去河南核查，查证结果，检举情况属实。外调人员不待返回昆明，便从内黄县电告政治部领导，政治部报告军区党委批准，对王自正实行隔离审查。

12月31日，专案组决定对王自正进行“敲山震虎”，派军区保卫部干部直接找王自正核实有关情况。晚10时，保卫部保卫科长陈汉中、干事李伯志二人，走进王自正的隔离室，对躺在床上的王自正大声喝道：“王自正，起来！到食堂来一下，有点事！”王自正在弯腰系鞋带的瞬间，敏捷地从被窝里摸出两支手枪，当即扣动扳机，第一枪击中前面的李伯志腹部，李跌倒在地；第二枪击伤后面的陈汉中右手，陈忍着疼痛，立刻转身冲了出去，边跑边喊：“快来人哪！快来人哪！”王自正也提着两支手枪跑了出来。驻院警卫战士听到枪声和喊声，立即包围过来。王自正感到难以逃脱，便转身躲进厕所里。部队将厕所包围起来，令其放下武器，缴械投降。王自正走投无路，开枪自杀身亡。

按说，到此案情已经大白，但是，有关方面决定还要继续清查“谭甫仁被谋杀是否还有更深层次的背景”，搞得军区内人人自危，社会上谣言四起。其中最为离奇的一则谣言是：“1970年12月中旬，谭甫仁接到密令，命其于某日某时将飞越昆明上空的一架飞机击落。谭甫仁为人谨慎，狐疑难决，遂先将飞机迫降。不料飞机迫降后，走出舱门的竟是周恩来总理。总理一言不发，立即起飞回北京。谭甫仁大惊失色，目瞪口呆，回军区大院后，还未向中央作出解释，即被军区保卫科副科长枪杀。不久，这位副科长和军区保卫部长又相继自杀。”某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公开书籍，仍然还在渲染这种离奇的说法。

#### ◇ 谭甫仁夫妇被杀案件中值得吸取的几点深刻教训

谭甫仁夫妇被杀案，除了久拖不结为社会上造谣者提供了土壤外，在其他方面的教训也不容忽视。当时，总政赴昆明军区工作组的某些同志在议论中，就感到有几点教训值得吸取。

一是保卫部部长的自杀本可避免。1971年1月27日，即农历正月初一，昆明军区保卫部部长、谭甫仁被害案专案组成员景儒林自缢身亡。在他留下的字条上写着：“保卫部原来就是个烂摊子，我来保卫部后，还在继续烂下去……保卫部出了这些事，叫我怎么说得清呀！”这明显是在继续清查“幕后指使人 and 同伙”的压力下，景儒林思想负担过重而自尽。但有关方面不但不反省这是无止境“清查”带来的后果，反而将其作为“更深层次背景”的“案中案”继续“深挖”，又隔离了更多的审查对象。

二是对王自正的“审查”有其名无其实。12月31日晚，王自正自杀后，专案组在他的枕头下面查获一个笔记本，里面记载着凶手被隔离审查后，对组织心怀不满和图谋杀人的计划：“我不能这样死，我要死，也要杀几个人。”他在笔记本中列出准备杀害的对象，有军区副司令员陈康、鲁瑞林、田维扬等。他权衡之后，又写道：“不如杀谭甫仁，影响更大，发泄心头之恨。”人们很不理解，为什么被审查对象可以在受审查期间毫无顾忌地书写行凶计划，写了后又长期没有被审查人员发现？

三是对王自正的隔离实际是离而不隔。王自正被宣布隔离审查后，形式上“离”开了住宿和办公的地方，关押在隔离室，但事实上并未将他与外界真正“隔”开。枪杀案本身证明，王自正起码两次离开隔离室外出作案，一次是潜入办公室窃取枪支弹药，一次是到42号楼枪杀谭甫仁夫妇。他两次“神不知鬼不觉”地溜出隔离室，然后又安然回到隔离室，这能叫做隔离吗？

四是王自正翻越两座院落难道没有留下痕迹？12月17日凌晨，王自正枪杀住在司令部大院的谭甫仁夫妇后，又跑到隔街的政治部大院寻找另一枪杀对象陈汉中，因陈出差在外未达目的，王悄然回到隔离室。他两次翻越司令部和政治部大院的墙壁或大门时（晚间院子大门关闭），难道没有留下可供侦查的翻越痕迹？最后还是小学生马××提供了王自正17日凌晨去过

政治部家属院的线索，才对王自正进行“敲山震虎”。

从谭甫仁遇刺到凶手被暴露自杀身亡，正好是两个星期。本来两个星期就真相大白的案情，却拖了近400个星期——1978年6月，专案组才在七年半的时间里什么新问题也没有“挖”出来的情况下，写出破案结论报告，经昆明军区、云南省委批准，上报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结论不得不承认：“谭甫仁夫妇被害系王自正一人所为，既没有林彪反革命集团插手，也没有同伙配合。”“景儒林的自杀是由于自愧自疚心理过重，思想压力过大所致。”“对因017案件被隔离审查的人员解除审查，恢复名誉。”

□ 原载《党史博览》2012年05期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胡海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             |          |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